

由神秘走向大众化的西域文化

——兼论新疆人民社对西域研究著述的出版

自古以来，西域在世人心目中是一个神秘的地区，它曾以独特的地理条件、众多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以及种族，变幻莫测的气候状况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先后吸引国内外诸多探险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军事家、情报人员、地理学家及政治家，多次冒险涉足该地区，进行各自不同的工作和活动，逐步揭开了西域这块土地神秘的面纱。他们的到来，不仅使西域由神秘变得平常，西域各方面的情况大白于天下，而且，为世人留下了他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考察西域方方面面的文化资料。它们是研究和探讨西域历史与文化的宝贵资料。今天，翻译整理这些资料并公诸于众，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多年来，新疆人民出版社为这方面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组织专家学者撰写和编纂有关西域历史与文化方面的著作、工具书和各类资料，已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出版文化。介绍和总结其出版成绩及经验教训，对今后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大有裨益。

西域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地区，这对多年以前的人们来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域已变得并不神秘了。但是，对现代人讲，在“西域”这个概念下的地域文化，其许多地方仍然吸引着各类人士前来涉足，或继续探险，或旅游观光，或考察研究。浩瀚的塔里木大沙漠、无垠无际的准噶尔大戈壁、曾被视为“游移”的罗布泊、神秘的楼兰、独具自然特色的喀纳斯、雄峙西天的天山、昆仑山、号称小江南的伊犁风光，以及各具悠久或悲壮历史的诸多名胜古迹等，仍然也是国内外各类人士的向往之处。

西域文化灿烂悠久，又丰富多彩。自汉代开始，在这一广袤区域，先后就有氐羌、塞人、匈奴、呼揭、月氏、乌孙、鲜卑、柔然、丁零、高车、铁勒、坚昆、突厥、突厥施、回鹘、吐蕃、沙陀、粟特、仲云、契丹、蒙古以及近代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满、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达斡尔等数十个部族（或氏族部落）和民族表演自己的剧目。由于西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复杂多变的人文因素，汉代前后的西域形成了诸多小“国”，史称“西域三十六国”（实为五十余“国”），如姥羌国、鄯善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抒弥国、渠勒国、皮山国、乌国、西夜国、蒲犁国、子合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宾国、犁鞬国、条支国、安息国、于阗国、月氏国、大夏国、康居国、奄蔡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笃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乌孙国、姑墨国、温宿国等。实际上，这些小“国”分别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文化特点和共同语族特点的人类共同体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它们的存在及其各具长短的历史活动，为西域历史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西域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诸多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更使西域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独特性。例如，游猎文化、游牧文化、农业定居文化、手工业文化以及丝绸文化、玉石文化等交织成形态各异的西域物质文化。由于自古以来西域与中原、周边国家的频繁交往，其宗教文化也呈现丰富多彩，如原始宗教的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

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各以自己的形态、表现形式和影响力，在西域留下了各自的文化痕迹。尤其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信徒面，创造了令国内外关注的文化形态，成为西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西域数千年来活动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在人类学上分别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吉斯语族，以及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等人类共同体，因此也留下了许多语言文化。如：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摩尼文、佉卢文、于阗文、利文、焉耆—龟兹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以及近代以后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蒙古文、锡伯文和汉文，它们与其相应的古代和近代十余种语言文化，组成了西域语言文字文化的大家庭。数千年来在西域这个舞台上先后表演各自剧目的数十个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各自都表现出独具特色的生存和精神文化，如衣饰、饮食、居住、生产、交通、运输、交易、社会生活、信仰、礼仪、艺术等方面，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并共同交织成西域民族文化万花筒。在西域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数十个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两千多年来或游猎，或放牧，或耕种，不断迁徙游动，各自用自己的文化特点给其活动地域赋予各类名称，形成了不同门类地名一千多个，诸如历史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文化地名、行政区划地名、经济地名、居民点地名等。这些地名是了解西域自然地理特点、民族特点、历史文化面貌以及西域与祖国内地交往关系的重要资料。以上所述，是古代和近代西域文化面貌的大致，要详尽了解西域文化的全面情况，并非易事。

汉代以前，中原政府对西域几乎没有多少了解。在汉代，中原政府使者到达西域。之后通过多年努力，西域归入祖国版图。从此，汉籍开始有了对西域的记载。后经隋唐、辽金、元明清一千多年的不断交往，西域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原人民对西域的了解越来越多，各朝正史对西域的记载日趋全面。但是，清末以前的记述多侧重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几个方面，而且资料多系转引、摘抄，内容多为表面情况。而真正对西域有全面、实质的了解则始于清中后期。乾隆年间，清朝最终统一天山南北，清政府空前加强了对西域（包括新疆及中亚一部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统治。随着清政府对西域管辖的加强，俄、英等殖民主义者也开始染指西域。一批为其服务的所谓探险家、地理工作者、情报人员、考古工作者等不断前来西域进行各项活动。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这类人员衔着一定的使命，或公开，或秘密，出没于新疆地区。这些人虽然代表着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利益集团，衔着各自不同的使命，或以考古、或以考察、勘测地理的名义刺探各类情报，但他们基本上都留下了以考察报告、游记、日记、图片、绘画、数据等形式的资料，有的还搜集当地民间的各类资料、实物等运往国外；更有些考古人员，将西域大量文物偷运国外，收藏于各有关部门。虽然这些人从其动机、行为、作法上为世人所谴责，但从客观上来说，他们留下的资料，为后人研究西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后人通过这些资料，可以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西域。而且，西域（新疆）不少古人类遗迹，使这些人才得以发现，或为后人提供了发现的线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对西域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以及研究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一大批研究专著、文集、资料集、译著、工具书等先后被出版发行，为世人全面了解西域文化提供了全方位读物。总结历史以来国内外人士对西域文化的了解，确实走过了一个由近及远、由表面到实质、由少到多，又由神秘到大众化的路子。目前的西域文化已贴近了广大民众，已为国内外人士所领会和理解，并向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对此，

作为我区重要文化出版部门的新疆人民出版社可谓功不可没。

新疆人民出版社自成立之始，便把弘扬和发展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作为出版方向。几十年来，先后出版有关西域文化方面的著述数百种（含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六种文字读物，以下仅以汉文为准），其中包括新疆各民族简史简志、社会调查资料，新疆历史及各民族史研究专著，单民族史，研究论文集，由英文、俄文、日文、阿拉伯文等翻译的历史、文化、游记等读物，新疆历史资料集、古籍文献、档案、工具书等，打下了西域文化研究的基础，扶持了一批西域研究方面的各族专家、学者和译者。

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我区人文科学研究几乎未能真正开展起来，因此，这期间，新疆人民出版社未出版几本具有西域文化积累方面的图书，只有数种民间文学方面的读物陆续被推出，如《维吾尔民间歌谣》、《维吾尔民间故事》、《维吾尔民间谚语》、《维吾尔词曲》、《哈萨克民间故事》、《新疆民歌》、《汉维简明词典》等。可以说本社这 30 年的出版活动，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就是说缺乏西域文化特色。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决、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事业也蓬勃发展，出版物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越来越浓厚，其文化（知识）积累和学术性也日益显现出来，新疆人民出版社成为我区有关西域文化读物出版的中心，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形成了自己的各类特色读物群，大大推动了西域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些读物包括历史、民族、民俗、考古、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地理等广义文化方面的门类，其形式以专著、文集、志书、索引、全书、工具书等为多，这些读物都成为本社的精品和畅销品，备受读者欢迎。如各民族“五套”丛书、《新疆简史》（1—3）、《锡伯族史》、《江格尔》、《玛纳斯》、《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多卷本）、《历代西域诗钞》、《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锡伯族研究》、《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哈萨克族文化大观》、《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西域图志校注》、《丝绸之路研究丛书》（1—13）、《亚洲探险之旅丛书》（1—10）、《探险与发现丛书》（1—10）、《西域探险考察大系》（1—10）、《西域文化丛书》（多卷本）、《新疆汉语方言词典》、《新疆民族辞典》、《西北民族词典》、《西域地名词典》、《中国丝绸之路辞典》、《锡伯族百科全书》、《中国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西域研究书目》、《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丝绸之路研究书目文献索引》、《交河故域保护与研究》、《各市县志丛书》（多卷本）、《新疆通志丛书》（多卷本）、《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上下）、《新疆宗教》、《民国新疆史》、《新疆屯垦》、《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新疆地理手册》、《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上中下）、《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等近 200 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1—13）从不同角度就西域考古、岩画、古代居民及种族人类学、艺术、民间文学、医药学交流、草原石人、草原民族、屯垦、龟兹史、宗教文化、东察合台汗国史和人口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是改革开放以来专家学者对西域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西域探险考察大系》（1—10），主要为译著，收入了斯文·赫定、享宁·哈士纶、贡纳尔·雅林、橘瑞超、兰登华尔纳等人在新疆罗布泊、喀什噶尔、蒙古等地的探险著作，也收录了谢彬的《新疆游记》等；《探险与发现》（1—10）多由译著构成，收录了斯文·赫定、贝格曼、特林克勒、享廷顿、约翰海尔等人在西域的探险著作，也收入了天涯游子、黄汲清、陈庚雅和袁国映的西域（新疆）探险记；《亚洲探险之旅丛书》（1—10）均为译著，分

别为了科兹洛夫、斯文·赫定、阿托金逊、邦瓦特洛、普尔热瓦尔斯基、扬哈斯本、大谷光瑞、河口慧海和多隆的在帕米尔、罗布泊、西藏、蒙古等地探险考察的著作。上述 40 余种著述除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外，均为探险考察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经历，均系西域研究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内容丰富，资料可靠。除了上述 200 种著述和资料外，本社还陆续出版了有关西域政治、经济、民族、宗教、语言文字、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普及性、通俗性读物，这些读物是西域文化图书走向大众化的尝试和表现，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

通过回顾新疆人民出版社上述图书的出版实践，有如下问题值得总结：第一，地方人民出版社的品牌就是文化（知识）积累性读物和学术著作，而且其读物必须具备地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第二，出版品牌图书能否取得成绩，与本社高层领导尤其是总编辑的知识水平、选题策划能力和文化意识关系极大，何时的领导有了这些素质和能力，何时就有品牌读物不断被推出，否则就是成绩平平。第三，品牌读物的经济效益都不能很快实现，但它们往往是畅销书，而畅销书慢慢实现的经济效益，往往被忽视或看不到，这是人们只顾眼前利益所致，说明给出版社带来稳定利润的，也有品牌书的功绩，只是人们没有算细账而不明其理罢了。出版社对品牌书的投入，应有战略眼光。

综上所述，西域曾经是一块神秘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诸多文化形态，它们与西域独特的自然环境整合，呈现出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异彩，因此，自古以来一直吸引国内外各类人士前来涉足，留下了他们对这块土地意犹未尽的述说。后人通过西域文化出版物的不断灌输，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以认识真实的西域、真实的西域文化。人们爱西域，更爱这里的文化，因为它给人以粗犷的美、原始的美和精神的享受。

文化交流与译著出版

(一)

文化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有关知识、信息、科技以及思想、观念、认识、理念、道德礼仪等等相互进行传播交流的人文现象。自从人类形成以来，文化交流便已存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提高，文化交流的范围越来越扩大，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内容越来越丰富。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如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同一国内各民族之间，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具有许多受限制的因素。例如，国与国之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异性，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制约它们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因素；在同一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受制约的因素主要有宗教信仰及其文化的差异，以及民族整体素质及文明水平的高低。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出于落后国家和后进民族认识水平及文化接受心态、能力的严重限制，往往对外来（包括国外和族外的）的先进文化认识不到其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而产生排异性和抵触行为。这就是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之所以呈现缓慢性的重要因素。

文化交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人员往来、学生出国留学、媒体的宣传和影响、各类文化产品的输出输入、经济交往、艺术交流、异国婚姻、图书翻译等。另外，伴随战争的文化侵略，虽然主观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输出”行为，但客观上具有较强的文化渗透和传播效果。历史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已具有时代化的特点。首先，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普遍对相互间文化交流的功能和作用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各国、各民族之间自古形成的文化壁垒日渐减少，相互间的文化认同心理日趋加强。其次，文化交流渠道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文化的主动传播与被动传播，主动接受与被动接受之间，已没有了明显的界线，文化已无处不在，无时不表现。再次，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表现为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和局部战争，已越来越明显带有了文化交流和冲突的性质。第四，落后国家和后进民族在日益加强的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氛围和形势下，文化接受和兼容心理普遍加强，国家要开放，民族更要开放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正在形成。

文化交流的历史，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因社会发展进度的差别而呈现出长短不一的现象。我国因数千年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不仅时间短，而且交流范围极其狭窄；而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也受到了封建社会形态的严重限制，到辛亥革命前夕仍然处于各自封闭的状态。新疆地区的情况与我国内地相比，既有共同之点，又有自己的特点。所谓共同点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工业文明以前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缺乏交流与了解。所谓自己的特点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各氏族部落、各部族、各民族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丝绸之路文化也曾经在此繁荣发达，留下了随处可见的文化痕迹。尤其是古阿拉伯文化、古印度文化以及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外来宗教文化等，使新疆自古表现为古代外来文化交汇和交流的胜地。但是，唐代以后这种景象已不复存在，一直到清末，新疆的文化封闭状态仍然很严重。清朝末年，随着沙俄的东扩，新疆封闭的封建大门被慢慢打开，接着，英俄殖民文化纷纷侵入新疆天山南北，新疆文化封闭局面基本结束。从此，沙俄势力在新疆逐步占上风，一直到新疆和

平解放，俄罗斯的文化影响在本区始终存在，并一直作为惟一的外来文化形态而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区各民族基本处于各自封闭的状态，彼此的文化交流虽个别、局部间有些进行，但大的方面的交流未曾有过。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民族之间的隔阂逐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彼此的文化交流逐步深入。然而，由于国内大环境的原因，新疆与国外的文化交流，除了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与苏联有些交往外，30 多年基本处在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了逐步的改变。目前，新疆与对外以及新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无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文化交流的实质和目的是吸取别人的先进文化，促进自己的经济、文化更快发展，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始终处在高度封闭的封建文化及其所遗留的氛围里面，对外面世界的发展和对近现代工业文明所创造的先进文化一无所知或缺乏了解，所以，即使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我们对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功能、作用、实质等，缺乏深刻的认识，把一切外来文化拒之门外，长时间把自己置于与世隔绝的孤立境地，失去了很多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机会。这是历史的沉痛教训，必须深刻吸取。

对文化交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从本质上讲，属于相互交流范围的文化事象和现象，一般均表现为先进或中性文化形态，而这些文化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提高，其国界性、地区性和民族性特点会日益淡化，以致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取向，并在此文化形态下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道德礼仪、审美标准、心理状态、习惯意识等。从此可以看出，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落后状态，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水平。

现在，新疆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全国一样，已进入历史性阶段，可以相信，新疆与国外、新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届时，无论是文化交流的范围还是交流形式，将会更为拓宽和多样化。

（二）

在文化交流诸多形式中，国与国之间读物的引进、翻译和出版，以及同一国内各民族文字读物相互转译出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省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上述两个层次的译著出版活动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更为突出。新疆和平解放初期，各民族群众在脱离愚昧状态、初步摆脱文化贫困、获取外面信息、提高思想觉悟方面，靠的主要还是这一文化传播形式（即把各类汉文读物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读物）。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新疆各民族分别从封建农奴制、氏族制末期等社会形态步入社会主义，经济落后，文化极度贫乏，仍处于愚昧状态。对此，党和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即刚一解放便开始加强文化建设，1951 年成立了全疆惟一的综合型出版机构——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当年就开始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四种文字出版各类读物，而且出版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加强，出书范围一年比一年扩大。1954 年和 1956 年又分别成立锡伯文和柯尔克孜文编辑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业务始终表现出蓬勃向上的景象。分析这一期间（1951—1965）出版的六种文字的五千余种读物，一是门类齐全，如政治理论、毛泽东著作、哲学、法律、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医药卫生、科技以及中小学各类教材等。二是 60% 以上为译著。这一时期的译著形式均表现为由汉文译为五种少数民族文字或部分少数民族的读物译编成汉文读物，其门类多集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等数个类别，而且均为普及性读物。三是各文种译著发行量都比较大。在译著形式中，本阶段基本谈不上国外读物的翻译出版，只有个别苏俄文学作品和马列著作单行本的翻译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情况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左”倾思潮泛滥，各民族文化遭受空前摧残，新疆各出版社出版的数千种图书基本表现为“左”的产物。从译著出版角度而言，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文字的政治类译著。但除了个别马列著作单行本译著外，无其他类别译自外文的译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战绩也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随着思想解放、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趋加强，大量不同文种的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历史地理、哲学、经济等方面的读物被引进，给出版系统翻译出版创造了条件，尤其是为我区各族人民带来了了解外国思想文化的机遇。十余年间，我区各家出版社，尤其是新疆人民出版社以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为契机，先后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文字翻译出版各类译著近 200 种，囊括了各国最流行的名著。如：《一千零一夜》、《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欧也妮·葛朗台》、《好兵帅克》、《堂吉诃德》、《爱丽丝奇遇记》、《双城记》、《简爱》、《基度山伯爵》、《黑奴吁天录》、《惊婚记》、《驴皮记》、《十五岁的船长》、《成吉思汗》、《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海底两万里》、《红与黑》、《浮士德》、《爱玛》、《古莱什少女》等。汉文版也有部分历史、文化、文学等类译著出版，如：《喀什噶利亚》、《西域文化史》、《中亚简史》、《丝绸之路》、《西回鹘国史研究》、《五代回鹘史料》、《鲁达基诗集》、《克莱默夫妇》、《井上靖西域小说选》、《西域探险考古大系丛书》、《亚洲探险之旅丛书》、《天山游记》等。在新疆各民族文字之间互译出版方面成绩也是很大的。首先，由汉文译成维吾尔、哈萨克等文字方面，也是以汉族古典名著和当代流行小说为牵头，取得了较大成绩。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红岩》、《沸腾的群山》、《故后武工队》、《青春之歌》、《创业史》、鲁迅著作多部单行本、《林海雪原》、《暴风骤雨》、《金光大道》、《艳阳天》、《李自成》、《红旗谱》等。其次，先后出版了诸多少数民族文字与汉文合璧或英俄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有关科技、教育、语言、法律、经济、人名、历史、地理、医药等方面的大中小型具有编译性质的工具书，并成为新疆出版文化的特色领域。再次，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也出版了诸多由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满）文译成汉文的有关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创作文学）、古籍等方面的译著。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出版体制开始动摇，我区译著出版已难以为继，只保持着文学等几个门类畅销的译著（且主要为译自汉文的民族文字读物）出版，而译自外文的汉文译著，其数量更是少之又少。

综观我区几十年译著出版的历史，本人有以下几方面的认识。第一，由于我们对出版文化几无研究，因而译著出版在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功能一直没有深刻认识，使我们对这一文化现象一直熟视无睹。从实践上看，新疆各族人民相互了解文化内涵以及了解外来文化，各类译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在了解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如果没有汉族古典文化作品的翻译出版是很难做到了解内涵、理解精神的。第二，译著出版是图书出版中较为艰难的工作，其工作涉及原作者、译者及版权等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而且出版方的投入也较大，需要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第三，随着双语或多语教育的普及和深化，以及掌握各国语言人群的日益扩大，直接阅读汉文及外文读物的各族群众已很普遍，这越来越导致译著出版的削弱。译著出版似乎成为一种出版业发展中的一段历史，未来的译著出版似乎前景暗淡。第四，译著出版是具有较强文化性的出版活动，它对提高各民族素质，使其融入各民族、各国共同的先进文化体系，具有很大的帮助。第五，从我区各民族文化素质的实际看，译著出版仍有一定的潜力可挖，不能完全放弃这一文化出版形式，因为它对文化交流仍有较强的实际意义，必须引起各方面的继续重视。